

李骞 著

立场与方法

li chang yu fang fa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立场与方法

li chang yu fang fa

李骞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立场与方法 / 李骞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22-06909-1

I . ①立… II . ①李… III . ①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 ①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4625 号

责任编辑: 苏映华 马跃武
创意设计: 昆明非鸟视觉艺术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立场与方法
作 者	李 骞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909-1
定 价	19.00元

第一辑 “水浒”探源	—1
一、“水浒”真义考辨	—3
二、谁是《水浒》的作者	—6
三、《水浒》的创作时间辨析	—17
四、《水浒》的版本研究	—29
五、“替天行道”新解	—32
六、《水浒》的农民起义探讨	—38
七、《水浒》的“侠”	—48
八、《水浒》的“义”	—54
九、“逼上梁山”有几人	—69
十、“水泊梁山”的座次解读	—76
十一、“水泊梁山”的军事组织	—89
 第二辑 四方评弹	 —99
一、结构：诗歌的内外组合美学原则	—101
二、存在的焦虑：论《野草》的生存哲学	—110

三、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126
四、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分析	—140
五、火一样的真情 火一样的诗 ——柯仲平诗歌漫评	—148
六、崇高的美：论李瑛的西部诗歌	—150
七、诗心如火：论李瑛四十年代的诗歌	—161
八、论韩作荣的诗	—167
九、情感的雕塑：再论韩作荣的诗	—177
十、寓意的深刻：《怀念狼》的叙事模型分析	—182
十一、逃亡与寻找：《丑行或浪漫》的叙事板块分析	—187

第三辑 云南概说 —191

一、如椽大笔彩云南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云南文学描述	—193
二、云南“现代”诗歌散论	—209
三、文学的收获 ——云南省第六届文学获奖作品阅读札记	—215
四、感物咏志总关情 ——读《边疆文学》“宁蒗专号”札记	—222

五、智慧的诗意写作	
——评黄立新的诗集《沉香》	—231
六、生活的诗和诗的生活	
——评黄立新的诗集《行者》	—237
七、文化生态的抒情写作	
——读熊清华的“保山系列散文”	—243
八、“千辛万苦出深山”	
——评长篇小说《翡翠翠寒》	—248
九、强度的感情与浓缩的语言	
——评樊忠慰的诗集《绿太阳》	—252
十、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中篇小说《方向盘》人物分析	—255
十一、文化痕迹的诗意叙述	
——《楚雄地方文化丛书》漫评	—260
十二、《火恋》序	—263
十三、《榴花馆诗存》序	—271
十四、《水草集》序	—273
后 记	—278

第一辑 “水浒”探源

一、“水浒”真义考辨

一部描写绿林强人的长篇小说为何称之为“水浒传”，“水浒”的含义是什么？它和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山匪水盗有什么内在联系？作者为何以此为书名？这确实让后人研究者颇动了一番心思。

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是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该书在明朝万历年间刊印出来后，就有较大的市场，影响很大。而“发凡”却说：“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其居海滨之思乎？罗氏之名微矣！”袁无涯本认为，这部书不以梁山为书名，也不以宋江为书名，是因为梁山不是贼人居住之地，宋江等一百零八人也不是杀人越货的贼人。虽占据水泊，但他们从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领土，而是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他们只是“率土”之“王臣”而非山林之“盗匪”。袁无涯本的观点是，宋江等一百零八人，虽然身在水泊梁山，内心却时刻不忘报效大宋王朝。他们之所以暂居水泊，无非是效法当年的姜太公在渭水蛰居等候时期，一旦机会到来，便招安进朝，出将入相，辅助君王，以成千秋大业。这种观点实为附会穿凿，难

以令人信服。宋江其人，论智商、论人品、论才华，岂能和姜太公同日而语？从文本的分析来看，宋江无非一贼人之首，无经天纬地之才，无良臣宰辅之德，连一世枭雄都不够格，充其量也就是一仗义疏财之黑帮大哥而已。

金圣叹在《贯华堂水浒传·序二》则认为，因为宋江等人是“恶物”，施耐庵取名为“水浒”是弃之水边之意。金圣叹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曰《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若夫施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哉？”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思想较为激进的文学评论家，他虽然称赞《水浒传》是“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甚至于把《水浒传》与《庄子》、《史记》、《离骚》、“杜诗”比肩齐媲美，称之为“第五才子书”，但这只是对创作者的肯定，而对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宋江则是深恶痛绝。因此，他认为施耐庵为宋江等人作传，又用“水浒”作书名，其内在象征意义是要把诸如宋江之类的“凶物”、“恶物”弃之水边，驱逐出中国之境，“天下之所共弃也”。金圣叹对“水浒”二字的注解纯属望文生义，与原作的客观意义背道而驰，不足为信。

现代著名史学家罗尔纲认为，“水浒”取自《诗经·大雅·豳》。他在《水浒传真义考》一文中说：诗中的“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因慈祥仁义而深受人民拥戴，亶父深得民心，在岐下创建了周朝基业，而“水浒”正是亶父到岐山时经过的漆水和沮水的两岸。所以“水浒”的典故来自《诗经》，罗贯中用来作书名的主旨是以歌颂周王朝的发祥地来“表明梁山泊与宋王朝对立，建立新政权”。罗先生的考证主要是从农民革命立场来解答“水浒”之义，正确与否姑且不论。首先“水浒”之

名并不是从罗贯中开始,最早用这两个字的是元代剧作家高文秀,他创作的《黑旋风双献功》这部杂剧的第一折宋江有独白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其次,就算罗贯中用了“水浒”二字,他的思想境界也达不到为农民革命歌功颂德的这个层次。《诗经·大雅·緜》中的这一段诗是这样写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下。”按《毛诗传》的解释:“古公,邠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周太王名。”如果把这段诗歌翻译成现代白话诗,意思是这样的:“古公亶父很想建国立家,第二天清早骑着马,顺着西方的水边往前走,来到岐山之下,与妃子姜性美女,为寻找居住地而观察。”从文本的表述看,诗歌中“水浒”的含义是大水边上的意思,与罗先生所考证的意义俨然不同。

还有一种来自民间的传说是,山东省东平府有座山口叫“睡虎关”,因谐音的缘故,被当地老百姓叫成“水虎关”,后来的说书艺人为了顺口,就说成“水浒传”。之后又经文人润色,改为“水浒”,取名“梁山”。山东省东平有没有“睡虎关”,笔者不曾考证过,但作为民间传闻,我认为是不可靠的,当然,作为“水浒”故事的民间口头文学创作,这样的传说也是无可非议的。

今人汪远本认为,“水浒”是“虚其词”之意,他在《水浒传拾趣》中说:“水浒”不一定有什么特指意义,只是泛指宋江等人在水边造反起家的传奇故事。这个观点几乎找不出什么破绽,从字面意义上说,比较符合作品的原始意义。

其实,“水浒”的确也就是水边上或水岸边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看《说文解字》是如何释“浒”字的:“水厓,从水午声。”其原始意义就是水岸边的意思。《诗经·王风·葛藟》云:“緜緜葛藟,大河之浒。”《尔雅·释水》注为“浒,水厓”。《毛诗传》注为“水厓曰浒”。《广韵·姥韵》注释为“浒,水岸”。

从以上注解看，“浒”就是水边或水岸边的意思。结合《水浒传》所描写的内容，这个书名的含意就是为水边或水岸边的绿林强人著书立传之意。必须说明的是，“水浒”这个书名并非施耐庵、罗贯中的发明，而是明代中叶以后的定稿者综合元人的杂剧内容而创造的。

二、谁是《水浒》的作者

谁是《水浒传》的作者，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现在出版的《水浒传》在封面和扉页上著的名字有的是施耐庵，有的是罗贯中，或者是施耐庵、罗贯中。意思很明白，《水浒传》的版权或者归施耐庵、或者归罗贯中，或者同属两人所有。但是，无论施耐庵还是罗贯中，这两个人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学术界尚无肯定结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在涉及两人的资料介绍时，都语焉不详，只笼而统之地说：生平未见史传，一般认为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人等等。很显然，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这些所谓的大家，在官方编撰的史书上是无证可考的，后人仅仅是根据古人的笔记、传奇之类材料的零碎记载为参照进行推论，因此，其真实性往往要大打折扣。这是因为古人留下的文字资料不仅十分有限，而且这些资料偏颇较多，漏洞百出。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从明代初年到现在，比较认可的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独立编撰的；第

二种认为是施耐庵、罗贯中合作的，即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第三种认为是施耐庵自己创作的；第四种说法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一部集累型小说，是经过民间艺人口头加工、书商编纂整理、文人最后润色而成。现在的学者支持第一、二、三种说法的都有。相比较而言，第三种观点支持率高得多，原因是这种说法的时间晚一些，特别是金圣叹的腰斩本出来后，金大才子假借施耐庵的名头写了一篇十分精彩、但又是欺世盗名的“施序”，这种论调便流传至今。下面不妨梳理一下各家之说，看看哪种说法更接近实际。

明代人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根据民间说书艺人的唱本所编的，如田汝成、王圻等人。这些人离《水浒传》产生的年代比较近，他们的观点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只要你认真推敲这些人的文章，就发现古人做学问非常马虎，不仅彼此之间互相抵牾，而且自己的说法也总是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关于罗贯中的记载，明代无名氏在《录鬼簿续编》中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这段话是极不可信的，为什么呢？首先，无名氏是谁？显然是个假托的名字，恐怕是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畅销书，在坊间的名气特别响亮，这个无名氏借助与罗贯中“忘年交”的身份炫耀一下自己。因为“忘年交”自然是一个年少、一个年老，或者相识的两人都是老年人。由于古人“七十古来稀”，所以五十五岁就可称老翁。那么所谓“忘年交”至少也是五十岁相知相逢，换言之，无名氏与罗贯中相识时，其中一人、或者两人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那么“别后又六十年”岂不是一百一十岁？无论罗贯中和无名氏，都不大可能活到一百一十岁，所以这《录鬼簿续编》中的话，恐怕也是鬼话连篇，难以令人信服。明人田汝成认为

《水浒传》是罗贯中独立完成的小说，不过，他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所说的话不仅不可信，而且语言之歹毒，令人不堪卒读。

“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坏之报如此！”不管田汝成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对作者如此仇恨，都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假道学、伪君子的话就更不足信。首先，他竟然毫无根据的断定罗贯中是南宋时代的人，言下之意，《水浒传》这部书早在南宋偏安一隅时就问世流传了，而事实上，根据文献记载，南宋小朝廷时代，所谓水泊梁山的故事，只是通过说书艺人的口在勾栏瓦舍流传，根本就不可能以小说的完整形式出现于南宋，而且他所说的罗贯中“编小说数十种”的言论也值得怀疑，现在能够查证的假托罗贯中之名的小说除《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外，只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但是只要认真细读，这些作品不仅语言迥异，而且叙述风格也天壤之别。说到作者的审美理想，就更不用多说，《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价值观就是相悖离的。因此，如果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出自一人之笔尚且还值得商榷，而其他几部从文本阅读的角度去理解，就根本沾不上边，找不着北。其次，田汝成和明代的一些所谓正统文人一样，认为《水浒》写宋江等人的事迹，不但是奸诈骗人之术，而且十分详细，这种坏书是不应流传的。第三，田汝成认为罗贯中写的《水浒传》是百般鬼诈，是教人心术变坏的书，所以，罗贯中的三代子孙都是哑巴，是老天给他的报应。田汝成怀着变态的心理，用这种恶毒之极的语言写出的文字，是不足为凭的，他的关于罗贯中是南宋人的立论更是不堪一击。事实上，南宋时代流传下来的与《水浒传》有关材料，比较有价值的当推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这是龚圣与根据南宋宫廷画师李嵩为宋江等

三十六人所绘的像而作的，每人一赞。《宋江三十六赞》是目前透露给我们的南宋时期《水浒传》故事较为直接的资源，特别是在李嵩的“三十六人画”无法寻觅的今天，“三十六赞”及序言就显得格外珍贵。然而，龚圣与也只是根据画写了一些应景文字，这不但不是《水浒传》小说本身，甚至于连小说的故事源头都谈不上。关于这个问题，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胡适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闻名的大学者，既然他“小心求证”出《宋江三十六人赞》仅只是在“绰号”做文章，那么这本书对《水浒传》的形成就不会有太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宋江三十六赞》的大部分文字都花在对“绰号”的解释和概括上，这对后来的说书艺人在坊间的表演或许有启示作用，但对宏大叙事的《水浒传》不过是冰山一角。无独有偶，同样是明人的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传记类》中也肆无忌惮地攻讦罗贯中。王圻的所谓“通考”，不过是田汝成的拙劣翻版而已，毫无新意可言。“《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王圻任意篡改田汝成的观点，企图“通考”出点新鲜花样，结果只是把“其子孙三代皆哑”翻新为“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也就是把原来的“编次”者罗贯中子孙三代成为哑人修改为“说者”即说这部书的艺人子孙三代皆哑，其用心之险恶，比田汝成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仇恨编撰者，后者连所有说书艺人都恨之入骨，这种公然亵渎千百万《水浒传》爱好者灵魂的恶劣用心，这种阻挠《水浒传》故事于民间流传的恶意行径，又怎么能够借助他们留下的笨陋文字考证出谁是《水浒传》的真正作者？

也不知是相互抄袭，还是以假乱真，总而言之，明代人大

多异口同声地咬定,《水浒传》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润色编次而成。如明人郎瑛在《七类修稿·卷二十三》中所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无名氏说罗贯中是太原人,郎瑛又说罗贯中是杭州人,这两个人的说法都不可信。因为无论施耐庵还是罗贯中都是一个假借符号,历史上断然没有这两人,至于为什么是假冒伪劣产品,后面还要详尽解说。郎瑛说《三国》、《宋江》(实际上就是《水浒传》较早的小说底本)都是杭州人罗贯中所编的,注意是“编”而非“著”。为什么会是“编”呢?因为他认为“必有旧本”,意思很明白,罗贯中是在别人写作的基础上加工、润色、整理而成的。如同当下的不法书商用剪刀、糨糊编成的大作一样。但他又不敢肯定,因为他还听说,《宋江》是“钱塘施耐庵的本”。这就是今人所说的耐、罗二人合作的根据。甚至于有的学者还考证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之类的无稽之谈,所依赖的材料就是“后学罗贯中编次”和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中所说的“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贯亦效之为《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也”。胡应麟的话不可靠,第一他是带着鄙薄的眼光看待这两部名著的,在胡应麟看来,《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演义性质的书“盖尤在传奇杂剧下”,不仅极端浅显简陋,而且令人不齿和可笑;第二,他所依靠的也是“世传街谈巷语”的材料,并没有作周密翔实的考证,所以还是自以为是断言,施耐庵就是元代“武林”中人。这种无详尽文字作依据,无出土文物作佐证的所谓“师徒合著”说,纯粹是异想天开。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卷六》中也认为是施、罗合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有百有八人,当世尚之。”高儒从内心深处就敌视《水浒传》所表彰的宋江等人,

称之为“宋寇”，因此高儒之说也是拾人牙慧，以讹传讹。由于受时代的限制，王圻、田汝成、高儒这些所谓正统的文人学士，对《水浒传》所宣扬的反政府行为是持敌视态度的，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拒绝这部小说，反对《水浒传》在民间流传，因此，他们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所持的言论，大多穿凿附会，断章取义，不能作为真凭实据的立论，只能作为参考。明代思想家李贽也认为《水浒传》是施、罗合作的，只不过他认为这部书是二人“发愤”之作。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李贽明确说道：“《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传其焉。”李贽关注的不是《水浒传》的作者，他所关心的是这部书的思想内容和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实愤宋事”是指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借《水浒传》批评宋王朝不用贤人，对外屈辱称臣，抒发施、罗二人失国孤臣的忠义之愤。因此，李贽对《水浒传》作者的看法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而且他的施、罗二公“发愤合著”说明明显是沿用前人的言论。

现在出版的《水浒传》多数署施耐庵的名，于是便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即《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最后的编辑、整理、定稿者是施耐庵。其实，这种观点明代后期就比较盛行，如明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表面上看，这篇文章似乎很全面，对施耐庵生平干了些什么事？为什么要写《水浒传》？除了此书还写了些什么著作？都做了一一说明。因为王道生自称是施耐庵的晚辈和邻居，所以他杜撰的这篇“墓志铭”就成为后人认定《水浒传》是施耐庵创作的主要明证。但是只要认真揣读，便发现这篇施耐庵的“墓志铭”假而又假，纰缪颇多。文章开篇写道：“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